

穆萨·萨德尔与黎什叶派

吴冰冰

摘要:穆萨·萨德尔1928年出生在伊朗,1954~1957年在伊拉克求学,1959年来到黎巴嫩,成为黎巴嫩什叶派宗教和政治领袖,使什叶派进入黎巴嫩的权力中心,什叶派宗教领袖成为一种政治力量。可以说,他改变了黎巴嫩什叶派,也改变了黎巴嫩。

关键词:穆萨·萨德尔;黎巴嫩;什叶派

Abstract: Musa Sader was born in 1928 in Iran. He went to school from 1954 to 1957 in Iraq and came to Lebanon in 1959. After that, he became religious and politics leader of Shiah Sect in Lebanon and made it get into the middle of authority. The religious leader of Shiah Sect is politic power. So we can say that he changed Shiah Sect in Lebanon and Lebanon.

Key words: Musa Sader; Lebanon; Shiah Sect

一、家世和早期活动

穆萨·萨德尔1928年3月15日出生在伊朗库姆的萨德尔家族。该家族是什叶派望族,分布在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源于黎南部的阿米勒山地区。穆萨·萨德尔曾谈起过自己的家族:“我生于伊朗,祖父是萨德尔,我们家族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曾祖父萨利赫是苏尔县沙胡尔村的宗教学者,他们父子俩在土耳其人统治末期逃亡伊拉克,在那里成了家。他的一些子孙移居伊朗,在那里成家立业。我奇怪地发现我的祖先有黎巴嫩的特性,即迁徙性,从来没有两代人生活在同一个地方。”^[1]

穆萨·萨德尔的高祖萨利赫·沙拉夫丁(1710~1802年)出生在黎的苏尔县沙胡尔村,是宗教学者。1775~1804年,奥斯曼帝国总督艾哈迈德帕夏统治黎南部期间,大肆迫害什叶派宗教学者。萨利赫遭监禁,后设法逃到伊拉克,定居在什叶派圣城纳贾夫。萨利赫的孙子赛义德·伊斯马仪(1849~1919年)被称作赛义德·萨德尔,是什叶派仿效的渊源。他是穆萨·萨德尔的祖父,萨德尔家族由他得名。伊斯马仪·萨德尔的第四子萨德尔丁·萨德尔(1882~1953年)是穆萨·萨德尔的父亲。一战后,英国控制下的伊拉克对什叶派采取限制政策。在这种背景下,包括萨德尔丁·萨德尔在内的一批什叶派宗教学者离开伊拉克来到伊朗。

穆萨·萨德尔的数代祖先都是什叶派宗教学者,母亲出身什叶派宗教学者世家。穆萨·萨德尔就是在这样一个具有浓厚什叶派宗教氛围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

穆萨·萨德尔接受的是现代和传统相结合的教

育,他本人更喜欢现代教育。1934年,他在库姆新式小学巴基里亚学校就读,随后在库姆的萨纳伊学校读书,1946年毕业。根据父亲的要求,从1941年开始,他同时还在库姆宗教学学校学习。穆萨·萨德尔接受了系统的传统宗教教育,研读了伊斯兰哲学和苏非理论。他的老师有霍梅尼和沙里亚特·马达里,同学有比希什提、穆尔台道·穆塔海里、阿尔达比里和后来的伊朗领袖哈梅内伊。那时,他也没有回避现代教育,1950年他进入德黑兰大学法学院学习,1953年获学士学位,是第一个有大学学历的什叶派宗教学者。^[2]他的志向并非当宗教学者,但经过父亲的劝说,决定重新接受伊斯兰传统教育。1953年,父亲去世。1954年,穆萨到伊拉克的纳贾夫求学,师从著名什叶派宗教学者大阿亚图拉穆哈欣·哈基姆和穆罕默德·里达·阿勒·亚辛,还听过大阿亚图拉艾布·卡希姆·胡伊关于教法渊源的课程。1958年,他完成学业回到库姆。传统宗教教育和现代世俗教育对他的思想影响深刻。

穆萨是应赛义德·阿卜杜·侯赛因·沙拉夫丁(1873~1957年)的邀请来到黎巴嫩的。阿卜杜·沙拉夫丁属黎南部沙胡尔地区的沙拉夫丁家族,该家族同穆萨·萨德尔的家族有亲缘和姻亲关系。阿卜杜·沙拉夫丁在30年代中叶访问伊朗时见过穆萨,非常赏识他。此后,他因对自己诸子感到失望,便将穆萨视为未来继承人。

1957年夏,穆萨访黎后回到纳贾夫。同年12月30日,赛义德·阿卜杜·侯赛因去世。次年,侯赛因的家人写信邀请穆萨到苏尔。此时,穆萨已完成学业回到伊朗的库姆。他对是否接受邀请十分

犹豫,但他的老师阿亚图拉穆哈欣·哈基姆却劝他接受邀请。其理由有二:一是他同黎有渊源;二是赛义德·阿卜杜·侯赛因的去世在黎留下一个真空,穆哈欣·哈基姆希望由他信任的人去填补。为此,他还写信给黎的显贵们推荐自己的学生。

二、成为黎什叶派政治领袖(1959~1969年)

1959~1969年是穆萨·萨德尔在黎活动的第一阶段,成立了“伊斯兰什叶派最高委员会”,主要目的是在黎什叶派中确立自己的政治地位。

1918年奥斯曼帝国解体,叙利亚和黎巴嫩脱离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1920年,法国军队占领叙、黎,以黎巴嫩山和贝鲁特为中心,加上沿海城市、南黎巴嫩和贝卡,组成大黎巴嫩国。1926年,黎确立了以教派为基础的政治体制,法政府大力扶植基督教马龙派。1943年独立战争期间,主张完全独立的阿拉伯主义潮流战胜主张维持同法国联系的教派思想潮流,黎实现了独立,但以教派为基础的政治体制保留了下来,权力分配则以1932年的人口统计为基础。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基督教马龙派和伊斯兰教逊尼派。马龙派势力的基础在黎的山区,逊尼派势力在贝鲁特、的黎波里、赛达等沿海城市。什叶派主要集中在黎南部和贝卡地区,沿海城市中只有苏尔是什叶派的势力范围。在黎巴嫩,什叶派地区处于边缘化地位。“黎巴嫩的‘特殊个性’表现为马龙派山地思想和逊尼派城市传统的中合思想。什叶派不得不在这两种概念中开辟自己的道路。”^[3]

在黎南部和贝卡地区,直到20世纪中叶,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力量一直是封建家族势力。黎什叶派受阿斯阿德、哈里勒、扎因、欧赛兰、海德尔和哈马达等六大家族控制。在政治上,封建家族同什叶派群众乃至中产阶级的关系都类似于领主同附庸的关系。黎独立后,他们把持了议会和内阁,其代表是长期控制议长职位的阿斯阿德家族。从独立到20世纪80年代,阿斯阿德家族的两代首领艾哈迈德和卡米勒都长期担任议长。什叶派宗教学者的经济贫乏、政治沉默,长期处于封建家族力量附庸地位。他们承认封建家族势力的优越地位,在经济上依附于他们,在政治上支持他们。著名宗教学者谢赫穆罕默德·塔基·萨迪克是典型,他支持阿斯阿德家族,坚决主张政治上的无为主义。

上世纪50年代,黎什叶派地区的政治力量结构出现变化,左翼政党在什叶派地区发展很快,吸纳很多支持者。这些左翼政治组织有共产主义取向

的政治组织,如黎共和共产主义行动组织,巴勒斯坦武装组织有阿拉伯解放阵线和巴勒斯坦人民解放战线,阿拉伯民族主义组织有复兴党。对政治现状不满的什叶派群众开始从左翼政党中寻找出路。

在传统封建家族力量和新型左翼政党力量争夺什叶派大众的背景下,穆萨·萨德尔来到了黎巴嫩。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什叶派地区的政治力量角逐中,宗教学者没有地位。穆萨通过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努力使自己成为新的政治中心,使宗教领袖成为社会动员的核心力量,同传统政治势力和新兴左翼政治力量斗争。但是,他不挑战现存的什叶派政治领袖的地位,只是努力确立自己的地位。

穆萨·萨德尔的社会基础是什叶派新兴中产阶级,包括新兴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人。黎独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机构的扩展,什叶派离开内地迁到贝鲁特,由于海外什叶派商人归国,什叶派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医生、律师、公务员和中小商人,他们构成了新兴的什叶派中产阶级。他们虽不是虔诚的信徒,但较优越的经济条件与较低的政治地位间的反差,强化了他们的教派观念,使他们产生了联合的需要。50年代中叶,一批贝鲁特什叶派中产阶级自发联合起来,组成“社会斗争委员会”,以表达什叶派的不满和诉求。新兴什叶派中产阶级对传统封建家族政治力量不满,但又无法通过其他教派主导的左翼政党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政治和社会需求。穆萨的到来就为他们实现自己的政治需求提供了新的选择。事实上,正是这些人构成了穆萨早期政治活动的核心力量。

1960年,穆萨·萨德尔定居苏尔,担任清真寺教长。在从事宗教活动的同时,还从事大量社会活动。1960年,他通过建立慈善性的社会、文化和宗教组织开展社会活动。他的第一个重要举动是在苏尔建立了一个职业培训机构,使什叶派青年可受到培训。该机构耗资50万黎镑(约165万美元),资金来自黎教育部和银行贷款。他随后又在苏尔创办了慈善协会、孤儿中心、伊斯兰研究院、女子之家和护士学校,其影响急剧扩大。^[4]

1967年5月16日,黎议会通过法令,规定组成伊斯兰什叶派最高委员会来管理黎什叶派事务。1969年5月18日,该委员会正式成立,执委会共43席,议会的19名什叶派议员各占一席,宗教学者12席,世俗人士12席。穆萨·萨德尔当选为委员会主席,任期6年。在伊斯兰什叶派最高委员会成立前,议长是黎什叶派无可争辩的最高政治职位。

“该委员会的建立,并被授权在政治体制中表达什叶派日益增长的需要,在政治权力分配中引入了新的变数。”^[5]伊斯兰什叶派最高委员会的建立和穆萨当选委员会主席标志着他已成为黎什叶派的政治领袖,而不再是单纯的宗教领袖了。

三、建立和领导什叶派(1969~1978年)

穆萨领导什叶派投入争取社会、经济权益的斗争。1970年5月26日,他号召进行为期一天的总罢工,目的是使政府意识到南部问题的重要性。罢工后的一星期,政府建立了“南部委员会”,拨款3000万黎镑,支持该地区的发展。该委员会的创立是穆萨的一次胜利,但卡米勒·艾斯阿德却获得了该委员会的控制权,使他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以艾斯阿德为代表的传统政治势力不断与穆萨较量。70年代初中期,艾斯阿德和穆萨间的冲突加剧,但穆萨的地位却日益巩固。议会的19名议员中,6人支持卡米勒,13人支持穆萨。1973年底,伊斯兰什叶派最高委员会修正案规定,穆萨的任期从6年改为其年满65岁。艾斯阿德反对,但1974年11月,最高委员会驳回艾斯阿德的意見。在与什叶派传统政治势力的较量中,穆萨赢得胜利。70年代初期,他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左翼力量。

1970年的黑九月事件后,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战士大批进入黎巴嫩,黎的政治格局开始变化。马龙派反对巴力量增长,逊尼派和黎左翼力量则支持巴解放运动。穆萨试图走中间路线。1973年5月,黎军同巴解放组织发生冲突,黎脆弱的政治平衡被打破。马龙派和巴解间的矛盾激化,越来越多处于社会下层的什叶派青年不满现状,开始追随左翼力量。面对这种局面,穆萨只得同左翼争夺什叶派青年。

一方面,他得反映下层什叶派青年的不满和要求;另一方面,又须同左翼相区别,因此,他采用了非马克思主义的表达方式,即以伊斯兰传统话语来表达下层什叶派青年对公正和平等的渴望。1974年3月,他创立了“被剥夺者运动”。穆萨通过成立被剥夺者运动,将社会基础扩大到了广大什叶派下层。

黎马龙派同巴抵抗力量之间的冲突日益激化。1975年4月13日,黎内战爆发。内战初期,穆萨·萨德尔反对战争。1975年6月底,他来到贝鲁特的阿米里亚清真寺,绝食以示抗议。7月1日停止绝食。内战现实迫使他起来维护什叶派的利益。巴勒斯坦人、马龙派和德鲁兹派都有武装,什叶派也必须建立武装来保护自己。事实上,1974~1975年,重新阐释什叶派的传统成为他思想的主题,他通过对侯

赛因殉难进行新的阐释,反对政治无为主义,提倡政治行动主义。提出:“武器是男人的装饰。”

穆萨一直不承认什叶派有自己的民兵组织。但一次突发事件使他不得不公开什叶派的民兵组织。1975年7月,贝卡谷地巴勒贝克地区一营地发生爆炸,27名参加训练的什叶派民兵被炸死。7月6日,穆萨承认有什叶派民兵组织,名为“黎巴嫩抵抗组织”,简称“阿迈勒”,是被剥夺者运动的军事组织。

黎内战中形成了对立的双方:以马龙派基督徒为一方,主张维持教派政治现状;另一方是主张彻底改变现状的巴勒斯坦人与黎左派组成的联盟,目的是改变黎政治现状,建立全新的政治格局。1975~1976年,穆萨领导的阿迈勒运动同巴解组织、黎全国运动联盟站在一起,试图重新分配国家权力,改变什叶派现状。

1976年5月,叙利亚军队正式介入黎内战。叙反对建立极端的左派国家,主张黎维持现状。穆萨开始站在叙军一边,反对黎全国运动和巴勒斯坦人,认为黎全国运动领导人琼布拉特是个不负责任的人,试图利用黎内战的现状改变德鲁兹人同马龙派势力的力量对比,极力阻止内战结束,使什叶派同基督徒战斗到最后一人,从中受益。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所有的巴勒斯坦营地都处在什叶派为主的地区,很多什叶派青年追随巴解放组织。因此,巴解放组织的存在阻碍了阿迈勒运动在什叶派中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穆萨转而支持叙的军事介入,希望以此来维护什叶派利益,开始将巴人和黎左翼力量称作“新封建主义”。

1976年,约10~20万什叶派居民被长枪党从贝鲁特东北地区驱逐出来,这一残酷现实沉重打击了穆萨。1976~1978年,穆萨思想低沉,开始宣扬阿里·宰因·阿比丁的忍耐。1978年1月,在一次演说中,他指出,宰因·阿比丁并没有放弃或背叛阿里的教导,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贸然行动只会导致无谓的牺牲和事业失败,生存就是胜利。这表明他采取了务实主义态度。

穆萨阐述了阿迈勒运动同伊斯兰什叶派最高委员会的关系:“阿迈勒运动在组织上同该委员会毫无关系,它是被剥夺者运动的政治、军事部门,而委员会是该运动的民事、法律表达,在这个基础上,二者可以协作。”^[6]在穆萨的设计中,被剥夺者运动是他领导的群众运动的总体称呼,最高委员会是这个运动的合法民事形式,而阿迈勒运动是这个运动的政治和武装部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阿迈

勒运动已取代了被剥夺者运动。1973年开始担任议员、70年代末担任阿迈勒运动总书记的侯赛因·侯赛因尼说:被剥夺者运动本身就是阿迈勒运动。这一变化有两个原因:内战爆发后,伊斯兰什叶派最高委员会成为空壳。在这种情况下,阿迈勒运动就成为被剥夺者运动的惟一组织形式:穆萨所谓的被剥夺者,是一个广义概念,并不单指什叶派。他希望被剥夺者运动成为一个超越教派的运动,成为动员所有对现状不满者的力量。但是,内战的现实使超越教派的被剥夺者运动的目的成为不可能实现的空想。而阿迈勒运动也成为一支什叶派力量。在此情况下,70年代末,被剥夺者运动的名称被阿迈勒运动取代。这种名称的变化反映了政治取向的变化。

1978年8月25日,穆萨访问利比亚,同行的有谢赫穆罕默德·叶阿古卜和阿拔斯·巴德尔丁。8月31日,穆萨最后一次露面后,随即失踪。

四、思想与影响

穆萨的思想核心是在伊斯兰基础上调和伊斯兰传统与西方现代文明。他根据伊斯兰教义提出神、世界和人的概念。真主是先于一切而存在;世界是真主创造的,是有秩序的;人是真主创造的,是真主在大地上的哈里发。一方面,真主是根本,这是对伊斯兰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世界是可以认识的,而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真主在大地上的哈里发,是因为人是有理性的,可以认识真主和世界秩序。这三个概念综合起来,既符合伊斯兰教义,又为吸纳西方现代文明提供了空间。穆萨以这种方式对什叶派乃至整个伊斯兰思想发展史中的核心传述和理性关系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传述的具体表现是经训,理性则通过“创制”来体现。“穆萨·萨德尔坚信理性和传达是一个真理的两极,他试图调和二者。”^[7]虽然他认为创制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不得与《古兰经》和真实的《圣训》相矛盾,即理性不得与传述相违背,但他更强调的是理性的作用。他“意识到他处于一个伊斯兰与现代欧洲文明面对面的时代,他不得不调和伊斯兰思想与现代文明。他通过创制努力达到这一目标,将创制视为帮助伊斯兰面对时代挑战的惟一途径。创制是推动人运动并同他人竞争的因素。”^[8]穆萨还从伊斯兰文化的特性论述了创制的必要性,认为伊斯兰文化具有动态性,推动人类不断进步和发展,这事实上也是人不断接近真主的过程。因此,教规、教令必须满足不同时间和空间的人的需要,这只能通过创制来实现。

在这种思想基础上,穆萨对侯赛因的传统做出

新的解释。在传统什叶派思想中,卡尔巴拉殉难是无为和顺从。而穆萨认为,卡尔巴拉殉难告诉人们的是要人们学习他及其部下的勇气和决心。他通过重新解释什叶派卡尔巴拉的殉难,反对政治无为主义,提倡政治行动主义。

穆萨的政治行动主义使黎什叶派进入黎权力中心,什叶派宗教领袖成为一种政治力量。穆萨失踪后,什叶派对他的传统产生了不同理解。“两个什叶派革命在黎一起进行:一个极端的千年主义革命和一个改革主义主流革命。二者都被各自的支持者植入穆萨·萨德尔的传统。”^[9]这种分歧表现为两种教法观点、两个政治组织和两条道路的对立。在教法观点上,阿亚图拉穆罕默德·侯赛因·法德勒拉认为应当实行教法学家的全面统治;而阿亚图拉穆罕默德·马赫迪·沙姆斯丁则主张教法学家发挥有限作用的乌玛自我管理模式;真主党和阿迈勒运动分别接受了两种教法观点,前者曾一度主张按伊朗伊斯兰革命模式在黎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后者则在承认黎政治现实的基础上谋求对政治体制的改革。

穆萨失踪后,他亲手创立的伊斯兰什叶派最高委员会和阿迈勒运动都在温和的改革主义主导下。穆萨一直是伊斯兰什叶派最高委员会的正式领导人,到1993年他65岁生日那天,副主席穆罕默德·马赫迪·沙姆斯丁才接替他为主席。侯赛因·侯赛尼担任阿迈勒运动总书记,1980年4月4日,纳比赫·巴里取代他成为阿迈勒运动主席。1984~1992年,侯赛因·侯赛尼担任阿迈勒总书记和黎议会议长。1992年起,纳比赫·巴里担任总书记。

注 释:

[1]《伊玛目——领袖赛义德穆萨·萨德尔》,阿迈勒运动中央宣传办公室,2001年,第5页。

[2]Mohammad Seif Edd5ne Salman,Leadership Legitimacy in the Middle East:Imam Musa Sadr's Identity, Charisma and political Legitimatation in Lebanon 1960-1975, p. 17.

[3]Fouad Ajam, The Vanished Imam :Musa Ae Sadr and the shia of Lebanon, I. B. Tauris & Co Ltd publishers, London, 1986, p. 63.

[4][7][8]哈迪·法德勒拉博士:《伊玛目穆萨·萨德尔的政治和改革思想》,黎巴嫩哈迪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19、13、132页。

[5]Augustus Richard Norton, Amal and the Shi'a :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Lebanon ,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Austin, 1987, P. 44.

[6]陶菲格·麦迪尼:《阿迈勒与真主党》,叙利亚艾赫里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51页。

[9]Fouad Ajami , the Vanished Imam, op. cited , p. 217.